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編 第六冊

西周衰亡原因之探討

梁國真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6 冊

西周衰亡原因之探討

梁 國 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周衰亡原因之探討／梁國真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 99〕

目 2+150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編：第 6 冊）

ISBN：978-986-254-226-2（精裝）

1. 土地制度 2. 西周史

554.292

99012821

ISBN - 978-986-254-226-2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 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254-226-2

西周衰亡原因之探討

作 者 梁國真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35 冊（精裝）新台幣 5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西周衰亡原因之探討

梁國真 著

作者簡介

梁國真，台灣台南縣人，一九六一年生。成功大學歷史系、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畢業，一九九四年獲文化大學史學博士，現任明新科技大學人文社會與科學學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從典籍金文綜論西周之衰亡〉（碩士論文）、〈商周時代的東夷與淮夷〉（博士論文）、〈試論西周晚期的外患〉、〈試論商代宗教信仰型態的演變〉、〈西周春秋時代宗教思想的演變〉等。

提 要

西周之衰亡，有其複雜的因素和過程。本文綜合典籍與金文資料，從以下幾個角度加以考察：在王權發展方面，西周封建為政治的結構，原有王權與諸侯分權的特色，但是西周中期，王權意識已有所提高，厲、宣之時，王權的發展達於高峰；另一方面，貴族諸侯的勢力也逐漸強大，雙方因而產生權力的衝突，使政治局勢不安，並間接地導致西周覆亡。在禮法制度方面，西周中期時，王室與貴族講究繁文褥節，因而斲喪了周人的生命活力，而且形成豪奢的風氣，腐蝕社會的根本；此時禮法制度已產生變動或破壞，至西周晚期，破壞得更劇烈，這是西周步入衰亡的重要因素。在軍事方面，西周中期的主要外患是東南方的淮夷，到了西周晚期，淮夷仍叛服不常，北方的外患卻突然加劇，形成南北交侵的局面，厲王雖能平服淮夷，卻阻遏不了戎勢，宣王初期雖敗玁狁，定淮夷，卻消耗了不少國力，以致晚期時，對戎人的戰爭轉趨不利，此一情勢至幽王之時更加惡化，終使西周亡於戎禍。綜合言之，西周之衰，始自中期，而西周之亡，雖亡於幽王之手，但有不少因素已潛伏於宣王時代。本文即從上述幾方面，探討西周衰亡的過程及其原因。全文凡六章：

第一章「緒論」：分為二節，除了介紹金文的新資料，和西周史的研究趨向外，並討論西周初期軍事發展、封建和政治權力結構的背景。

第二章「政治的治亂和王權發展的衝突」：分為二節，主要探討西周中晚期政治治亂和王權的發展，與西周覆亡的關係。

第三章「禮法的僵化與社會的變動」：分為二節，從西周中晚期，禮法制度的變動或破壞，以窺西周覆亡的社會經濟背景。

第四章「軍事態勢的轉變」：分為二節，分析西周中期的外患情形，及其對西周晚期之軍事態勢所造的影響。

第五章「南北外患的交侵與西周的覆亡」：分為二節，說明南北外患交侵，對於西周覆亡的影響。

第六章「結論」：綜合討論西周覆亡的各種原因，並重申本文的主要論點。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西周新資料的發現與西周史研究的趨向	1
第二節 西周衰亡原因的再檢討	5
第二章 政治的治亂與王權發展之衝突	11
第一節 政治的治亂	11
第二節 西周王權發展之衝突	21
第三章 禮法的僵化與社會的變動	29
第一節 冊命金文的出現及其意義	29
第二節 禮法與社會的變動	33
第四章 軍事態勢的轉變	43
第一節 東方的再底定與南方的征伐	43
第二節 戎患的漸興與夷患的再起	55
第五章 南北外患的交侵與西周的覆亡	61
第一節 南北外患的交侵	61
第二節 西周的覆亡及其原因之檢討	75
第六章 結 論	81
參考書目	83
附錄一：試論商代宗教信仰型態的演變	93
附錄二：西周春秋時代宗教思想的演變	107
附錄三：試論西周晚期的外患	12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西周新資料的發現與西周史研究的趨向

史學研究必須依據資料，資料的多寡，往往左右學者對歷史的解釋。資料愈多，愈能掌握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資料愈少，歷史的真相，就比較難以了解。歷史事件之發生，往往有其複雜的過程和原因，而古代典籍所記，或以斷簡殘篇，難以詳其始末；或以年代久遠，真象已湮沒不彰。而且即使典籍所記較為詳盡，有些亦因各家見仁見智，而難成定論。所以新史料的出現，往往能補助舊史料之不足，最為學者所樂見。再者，我國上古史的文獻資料，多係經傳諸子，原有其特定的著作目的，卻據以考察某一歷史事件的原委，真是戛戛乎其難。《史記》一書，雖較為完整，但對古代史事亦僅記述一個大概而已，其內容可說甚為疏略，例如周本紀就是如此。文獻記載的古代史事，既是一鱗半爪，因此古史的研究，新舊史料的參得互運用，實為不可或缺的工作。（註1）

自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主張以「地下史料」來印證「紙上史料」（註2）以後，甲文、金文運用於古史的研究，成為地下史料中最基本的部分。以往甲骨文對於殷商史的研究，在學術上已有可觀的成績，金文之於西周的研究，相形之下，就沒有甲骨文那般地光彩奪目。但近數十年來，重要的銅器銘文不斷

〔註1〕這點從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以來，已成史學界共同的體認。

〔註2〕這是王國維先生所謂的「二重證據法」，見〈古史新證〉（收於《王觀堂先生全集》第六冊，台北，文華出版公司，民國57年3月）

出現，提供了許多新的金文史料，使西周史的研究風氣大開，時至今日，金文已有成為研究西周史主要材料的趨勢，如果捨金文資料不用，西周史的研究，幾乎難以進行。（註3）

近三十多年來，地下考古發掘的資料，為數甚為可觀，在西周部分，不僅有銅器銘文的出土，其他如建築、文化遺址和墓葬等的發現也很多，使我們對西周的文化風貌和禮制等，得以獲致更深的認識，茲將一些重要的新發現簡介如下，以便我們對西周史研究的現況有所瞭解：

民國六十五年（1976）二月，陝西岐山縣鳳雛村發現一座大型的宮殿遺址，學者推測這裏可能是周人早期都城岐邑的中心地區；（註4）次年，在這座宮殿基址下，又發現了大批甲骨，共一萬七千多片，（註5）這批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至昭、穆，包括了整個西周前期；（註6）這兩批文化的出土，有助於了解周人起源的問題。陝西臨潼縣所出土的「利簋」，曾掀起討論的熱潮，銘文記載武王在甲子日擊敗紂王，（註7）它是目前西周最早的銅器銘文。除了「利簋」之外，陝西寶雞曾出土一件「趶尊」，器形非常漂亮，是銅器藝術中的瑰寶，銘文記載成王五年舉行建成周的祭祀大典，（註8）從銘文中可以看出，武王已有營建成周的計劃，以統馭東土，但未竟其志即其世。另一件出土的周初銅器，是江蘇丹徒煙墩出土的「宜侯矢簋」，具有重要意義，銘文記載康王在宜冊令虎侯矢為宜侯，並賞賜宜侯土地、百姓和王人等，其數量相當多，是研究周初封建的好材料。以前學者認為宜是康王時，周人東進至江蘇的重要據點，（註9）但最近又有學者認為它是由中原流傳過去之器，

〔註3〕 1983年10月7日～17日，「人文雜誌社」等在寶雞和洛陽舉辦規模盛大的「西周史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有七十六人，發表的論文有數十篇，範圍涵蓋政治、軍事、經濟、制度、考古、金文和先周文化等，其中大部份論文都依據金文立論，由此可見目前西周史研究的盛況，以及金文資料之重要性。

〔註4〕 陳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十期，頁44～49。

〔註5〕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十期，頁38～43。

〔註6〕 李學勤，〈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文物》，1981年第九期，頁7～12。

〔註7〕 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八期，頁10～12。此器於民國65年3月出土。

〔註8〕 唐蘭，〈趶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第一期，頁60～63。此器於民國52年出土。

〔註9〕 唐蘭，〈宜侯矢簋考釋〉，《考古學報》，1956年第二期，頁79～83。此器於民國43年出土。

不能代表康王時周人的勢力，已經發展到江蘇丹徒。（註10）

近幾十年來，冀北熱河地區常出土西周銅器，遼東凌源縣海島營子村（即喀左北洞村）曾出土「匱侯盂」，後來喀左縣又發現周初銅器窖藏，北平房山琉璃河黃土坡村也出土早周復器，內容多記受“匱”錫賞，根據這些資料，學者認為第一代燕侯的都邑，就在北平地區，而且西周初期，燕國的勢力可能已越過燕山，而及於大凌河流域，（註11）這使傳統的說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臣諫簋」的出土，則有助於了解周初周人與戎人的關係，此器屬於西周前期，銘文記載戎人大舉來犯，邢侯禦之，由銅器出土的地點，可以確定邢之始封，在今河北邢台，而且綜合其他文獻記載，也可以判斷邢之受封，是帶有禦戎的作用，以捍衛齊、宋、衛、曹諸國。（註12）民國六十五年（1976），陝西扶風莊白村發現一大批窖藏青銅器，共計一百零三件，其中有銘文者七十四件，（註13）這座窖藏銅器包括了祖孫六代器，學者稱之為「微史家族銅器」，（註14）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牆盤」，盤銘歷敘武、成、康、昭、穆、恭六王之大事，以及高祖至牆的五代事蹟。微史家族銅器的出現，具有多項重要意義：第一，它提供了西周史研究的新資料；第二，這些銅器可以拿來作為西周器斷代的標準；第三，微史家族本身的歷史，可以作為研究西周世族發展史的資料。

西周中晚期的銅器另一重要發現，是陝西岐山縣董家村出土的一批裘衛家族銅器，（註15）它提供了西周中晚期，有關社會經濟一些重要資料。這批銅器包括了裘衛、公臣和旅伯三代。銘文內容記載裘衛和矩伯和邦君厲，各進行過一次土地交易，又有一次矩伯授給裘衛在某一森林的獵狐權。矩伯之所以跟裘衛進行兩次交易，都是因為要參加盛典，而向裘衛索取皮革製品和

〔註10〕黃盛璋，〈銅器銘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與吳國的關係〉，《考古學報》，1983第三期，頁295～304。

〔註11〕晏琬，〈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五期，頁274～279。

〔註12〕李學勤、唐雲明，〈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1979年第一期，頁56～59。此器於民國65年出土。

〔註13〕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簡報〉，《文物》，1978年第三期，頁1～18。

〔註14〕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的重要意義〉，《文物》，1978年第三期，頁19～24。

〔註15〕岐山縣文化館等，〈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第五期，頁26～44。這批銅器出土於民國64年2月。

其他裝飾品，當時的裘衛只是司裘的小官，到了第三代的旅伯，就已官拜膳夫。由這些銘文資料，可以看出當時的土地是可以交易的，而矩伯以土地和獵狐權來交換皮革裝飾品，顯示其家道已中衰，矩伯與裘衛兩家的消長，代表當時社會變動的一面。與裘衛同族銅器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倝匱」，年代屬於西周晚期偏早，銘文敘述一位職司牧牛者，因與其長官爭訟，違背了當初所立的誓言，依法應受一千鞭刑和墨刑，但經赦免，改成罰金三百鍰。由這項記載，可見西周時已有一套刑制，《尚書·呂刑》所記各種刑罰，並非虛構，而且銘文所敘之刑罰，與《周禮·條狼氏》之記載大體相合，因此《周禮》一書應非全為偽作，它有許多地方可能有其根據。（註16）

近年出土一件「多友鼎」，屬於厲王時器，銘文記載玁狁攻陷京師、荀邑等，擄走這兩地的人口，王命武公予以反擊，武公又命多友追擊之，多友四戰四勝，不僅奪回被俘之人，還擄獲戎車一百二十七乘，折首四百多人；銘文記載了五個地名，原本有助於了解玁狁的所在也，但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地名是在陝西，（註17）有的學者則考證是在山西，（註18）反而更增添紛擾。不過，根據銘文，可以發現武公軍隊的戰鬥力相當強，而且多友所俘獲的戎車有一百二十七乘之多，可知玁狁已會使用車戰。陝西扶風縣齊家村發現一件「猷簋」，是周厲王自作之器；（註19）後來陝西扶風縣白家村又發現一件「猷鐘」，也是厲王自之器，（註20）銘文後皆云「猷其萬年」，與「宗周鐘」同，由此可以證明宗周鐘可能是厲王自作之器，過去以其為昭王之器的說法，亦應有修正。河南省三門峽市上村嶺曾發現虢國貴族的墓地，共二三四座，還有三座車馬坑和一座馬坑，時代屬於西周晚期到東周早期，根據考證，這是“北虢”的墳墓遺址。其內涵豐富，年代下限明確（前655，虢為晉所滅），是研究西周和東周之際，特別是當時虢國文化面貌的一批典型材料。其中，車馬坑保存良好，已能相當完整的復原當時的車子，並補足了辛村、張家坡

〔註16〕 李學勤，〈岐山董家村訓匱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979年10月）。

〔註17〕 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其意義〉，《人文雜誌》，1981年第六期，頁87～92。此器出土於民國70年。

〔註18〕 黃盛璋，〈多友鼎的歷史與地理問題〉，《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1983年11月），頁12～20。

〔註19〕 羅西章，〈陝西扶風發現西周厲王猷簋〉，《文物》，1979年第四期，頁89～91。此器出土於民國67年5月。

〔註20〕 穆海亭、朱捷元，〈新發現的西周王室重器五祀猷鐘考〉，《人文雜誌》，1983年第二期，頁118～121。此器出土於民國70年。

車子，及輝縣琉璃閣戰國車子之間的缺環。(註21)

有關西周史的史料，由於典籍所載相當簡略，因此，金文及其他考古文物新資料的大量出土，提供了周西史研究許多寶貴的材料，使我們對西周史的面貌，有更清晰的認識，也因為如此，這些新資料就成為目前研究西周史的重要依據。

第二節 西周衰亡原因的再檢討

銅器銘文是目前研究西周史的寶貴材料，迄今為止，出土的西周帶銘銅器，已不下數百件之多，但這些銅器銘文，除了少數的標準器，明確地記載屬於那一個王之外，大多數都不知其正確的年代，因此，欲利用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首須做好銅器斷代的工作。西周銅器斷代綜合研究，始於郭氏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自從此書問世之後，西周銅器的斷代，才有了初步的標準，金文資料也才能大量地運用於西周史的研究上。因此，郭氏在銅器斷代上的貢獻，可以與董作賓在甲骨文斷代上的貢獻相媲美。繼郭氏之後，對西周銅器斷代做綜合研究的，有吳其昌的《金文麻朔疏證》、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和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他們四人所使用的方法，郭氏和容氏是以人名的繫連為主，銅器的花紋形制為輔，吳氏是從器銘的年月干支和曆法著手，陳氏則偏重於銅器的花紋形制。然而，理想的斷代方法，應該是人名與花紋形制和曆法並重，才能使研究成果臻於客觀，他們四人的斷代方法各有所偏，所得的結論，自然有不少地方不能盡如人意。如今，隨著新器銘不斷的出土，人名的連繫已有更多的依據，累積的花紋形制的知識，也愈來愈豐富，這些有利的條件，促使目前斷代的研究，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例如，以前定在成王時代的伐楚諸器，現在已必須改隸為昭王時器；(註22) 記伐東夷的「明公簋」和「小臣諫簋」等器，以前定在成王時期，現在也要改定在康昭時期；(註23) 記毛公三年靜東國的「班簋」，須由成王時代改定為穆王時代；(註24) 「宗周鐘」亦須由昭王時器

〔註21〕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上村嶺虢國墓地》(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十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10月)。這處墓地發掘於民國45~46年。

〔註22〕見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1981年1月)，頁12~162。

〔註23〕見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頁12~162。

〔註24〕見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

改定爲厲王時器。〔註 25〕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隨著銅器斷代研究的開展，有關西周史的許多問題也必須重新檢討和改寫。

器銘斷代的改變，固使西周史的許多問題必須重新改寫，大量金文資料和考古文物的出現，也大有助益探索西周歷史的發展，此外，典籍所載之史料，前人固有所研究，然隨著新資料的出土，亦不乏有可重新檢討者。西周衰亡的過程和原因，學者雖有所討論，但能吸收金文和考古文物新資料，佐之以文獻新解釋，而予以系統的研究者，尚不多見，因此，本文綜合典籍和金文，並博採當代學者的意見，對此一問題，提出個人研究的心得。

從政治、社會和制度方面來看，西周之衰亡，始自西周中期。而西周之所以自中期之後，開始步入衰途，以至於覆亡，有些因素與周天子的作爲有關，有些是屬於整個歷史發展的趨勢，有些須歸因於西周初期的軍事發展。因此，在開始討論西周衰亡之前，有必要先概論一下西周初期的軍政情勢，以便於後文之討論。

西周初期，周人最大的威脅來自東方。牧野一戰，周人雖克紂，代殷而起，統有天下，但周本西土小邦，其軍隊數量並不多，克商之舉，頗多借助於諸侯之力；〔註 26〕因此，牧野戰後，周人一時無法繼續東進，乃封紂子武庚於朝歌，以示妥協，並封三監以監視之。然武王去世後，三監聯合武庚反，奄和淮夷亦附之，局勢非常險惡，周人乃再次東征，經過一番征戰，才弭平亂事，底定東方。〔註 27〕由於河南山東是殷人政治勢力的核心地區，〔註 28〕

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 年第一期，頁 34。

〔註 25〕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1980 年 11 月），頁 104～119。

〔註 26〕《史記·周本紀》稱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伐紂，而諸侯兵會盟津者，有四千乘之多，可見周人的武力相當少，在諸侯聯軍中所佔的比例並不高，克商之舉，應該頗多借助於諸侯之力。

〔註 27〕關於二次東征，葉達雄先生認爲是成王親自率軍前往平定管、蔡的作亂，一方面派周公率軍直接討伐武庚，雙管齊下，等到管、蔡亂平之後，成王再前往伐祿父等東夷。（見〈西周文、武、成、康時代的文治與武功〉，《收於西周政治史研究》，頁 28，明文書局，民國 71 年 12 月）。杜正勝先生則認爲二次東征是由周公所領導，成王根本沒有參與（見〈尚書中的周公〉，收於氏著《周代城邦》，頁 157～220，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 8 月）兩說未知孰是，但不論如何，到成王五年維維邑建成後，東方可能已經底定。

〔註 28〕陳夢家曾根據古史傳說，與卜辭所見都邑和征伐的方國，定出商殷的四界如下：

北約在緯度 40° 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圍平原

殷人、奄和淮夷又曾大規模反周，因此，周初軍事征伐的重點，就集中在這個地區。同時，爲了加強控制，這裏的同姓封國也最多，《左傳》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郛、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邰、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註 29〕

同姓諸侯之封，是爲了「以蕃屏周」，據統計，這二十六國的分佈情形，在河南者十三，當全數之半，在山東者六，在陝西者三，在河北者一；〔註 30〕河南山東共有十九個封國，佔總數的三分之二強，其中還包括衛、魯、燕三個大封國，可見周人對東方用力之深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征服結果，對西周中晚期的軍防大勢，有很大的影響。楊寬曾分析西周封國的作用，他指出：郕、滕、魯是用以控制東夷和淮夷，蔣用以控制淮水以南的群舒及淮夷，邢控制戎狄，唐、韓也控制戎狄。〔註 31〕這些封國，有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有些則否。在東方，昭王時東夷又大反一次，經平定後，至宣王之時，東方似未再發生大動亂，可見這地區的征服很成功。邢唐之控制戎狄，根據臣諫簋及春秋初期邢侯破戎的記錄來看，「可知邢國的建立本來就有遏制戎人，作爲周朝北方屏障的作用，以護衛、齊、宋、魯等華夏諸侯。」〔註 32〕迄魯僖公二年，邢被狄人擊潰爲止，邢國一直都能圓滿地達成任務；唐則不然，根據《左傳》，唐之受封，是「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定公四年），爲周初重要封國之一，但觀西周晚期，玁狁肆虐，蔚爲北方大患，王師頻頻出動，可知唐並沒有發揮預期的防禦作用。在南方，有所謂「漢陽諸姬」，大概以蔣、隋最重要，但觀西周中晚

南約在緯度 33° 以北淮水流域與淮陽山脈
西不過經度 112° 在太行山脈與伏牛山脈之東
東至於黃海、渤海

而謂：「這個區域相當於今天行政區域的山東、河北、河南三省和安徽、江蘇兩省的北部，而以河南、山東兩省爲主要部份。」見《卜辭綜述》（台北，大通書局），頁 311。

〔註 29〕《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註 30〕見齊思和，〈西周地理考〉，原載《燕京學報》第三十期，收入《中國史探研》（台北，弘文館出版社，民國 74 年 9 月），頁 45～46。

〔註 31〕楊寬，〈西周春秋時代對東方和北方的開發〉，《中華文史論叢》，1982 年第四期，頁 109～132。

〔註 32〕李學勤、唐雲明，前引文，頁 57。

期淮夷爲禍之烈，亦可知些封國並沒有發揮作用。總括說來，東方是殷人勢力的核心區域，周人在此用力最深，所得的成果也最大，國基因之穩固，但相對地，由於在此耗費的精力過大，以致在其他方面的發展，顯得心勞力絀。在北方，只能採取守勢，在南方，雖略有進展，但成效不大，西周晚期獫狁與淮夷南北交相爲患，不能不說是肇因於此一軍事發展的特質。

周人統有天下後，大規模地實施封建，封建的種類，有親戚城邦、傳統古國和有功的異姓部族等，其中，同姓的親戚城邦才是封建制度的核心，〔註33〕其他非姬姓國家之封，是迫於形勢，情非得已。因此，姬姓國家大多封於平壤沃野和戰略要地，使能真正達到「以蕃屏周」的目的。而爲了確保同姓國家和王室，能彼此一直和睦相親，周人又把宗法制度運用到政治上。宗法制度包括昭穆制和大小宗制，其精神都是在提醒宗親意識，以便收族，進而達到鞏固社稷的目的。〔註34〕周襄王時的富辰曾曰：

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外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註35〕

此謂周人爲捍禦外侮，乃基於親親的精神，大肆封建，思以親屏周，徐復觀故謂：「封建的紐帶便是宗法的親親」。〔註36〕封建與宗法的結合，構成周人強大的內聚力，至春秋時曹的負羈猶言：「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註37〕春秋五霸的會盟精神，亦是源於此一親親意識。因此，宗法制度若破壞，即代表親親的精神衰退，王室與諸侯間的摩擦糾紛會擴大，周王朝將將步衰亂之途。

就西周的政治權力結構而言，周初大行封建，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諸侯既接受周天子的策封，就表示其土地和權力，都源自周天子，因此，策封所含的意義是：天下的土地所有權和侯國，都隸屬於周天子，《詩經》所云：

〔註33〕參閱杜正勝，〈周代封建的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三分（民國68年9月），頁489。

〔註34〕《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

〔註35〕《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註36〕徐復觀，〈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收於《兩漢思想史》，卷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69年3月），頁27。

〔註37〕《國語》，卷一〇，晉語四。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註38〕正代表此一政治理念。然而，天下莫非王土王臣的觀念，只是一個理論，實際上周天子對於諸侯的內政，大抵無法過問，諸侯的封國仍保持有相當大的獨立性；諸侯之所以能保持其獨立的地位，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組織，還比較鬆散，不足以支持周天子控制全國各地，另一方面是西周初期的封建，「亦包含有周王“無專享文武之功”的意思，從而使封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註39〕因此，西周的政治權力結構，基本上含有王室與諸侯分權的特色，任何一方的權力高漲，都將產生不安的情勢。

西周之所以趨於衰亡，有其政治、禮制和軍事上的複雜因素，本文將循此三大脈絡，探索它的過程和原因。

〔註38〕《小雅·板篇》。

〔註39〕李志庭，〈西周封國的政區性質〉，《杭州大學學報》，第一一卷第三期，（1981年9月），頁49。

第二章 政治的治亂與王權發展之衝突

第一節 政治的治亂

周人以蕞爾小邦興起，滅「大邦殷」，其統有天下的過程相當艱辛，尤其牧野戰後，「天下未集」，〔註1〕又遭「三監之亂」，殷人、東夷如淮夷俱反，給周人帶來莫大的壓力，後來亂事雖然平定，但周人凜於天命靡常，與得天下之不易，故形成強烈的憂患意識。為穩定新建的國家，故在政治上力求謹慎，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這種態度很明顯地表現在《尚書》各篇周初文誥中。例如在〈康誥〉和〈酒誥〉中，王告誡康叔不要耽於逸樂，要勤於治民，敬明其罰，以殷之墜命為戒；在無逸篇中，周公亦勉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都表現出謹慎戒懼的態度，徐復觀氏因此說：「在憂患意識躍動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據，漸由神而轉移向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這種謹慎與努力，在周初是表現在『敬』、『敬德』、『明德』等觀念裏面。尤其是一個敬字，實貫穿於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註2〕在如此謹慎戒懼的態度下，西周初期的政治，有可觀的成就，《竹書紀年》和《史記》均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註3〕雖有誇大

〔註1〕《史記·周本紀》。

〔註2〕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出版，民國52年4月），頁22。

〔註3〕《竹書紀年》之語，為《文選·賢良詔》注所引，見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72年2月。以下簡稱《輯證》），頁41。〈周本紀〉則云「四十餘年」。